DOI：10. 3969/j. issn. 1674-9391. 2012. 03. 002

70年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

——西南民族大学陈宗祥先生专访

陈宗祥/答 覃 影 张 强/问

[**摘要**] 陈宗祥先生是我国最早介绍、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者之一，也是《白狼歌》研究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翻译的《格萨尔王传》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格萨尔的参考资料之一，他提出"白狼语-南语-西夏语-普米语等一脉相承"的重要见解，被认为是对南语研究的一大突破。陈宗祥先生尤其将70年来对民族学乌牛白羊两系的探索，贯穿到他对东汉《白狼歌》部落史、古蜀史的考证和敦煌古藏文《南语写卷》的翻译研究上，独树一帜。学界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40至50年代，陈先生收集和翻译的海门道夫的中印边界东段调查报告，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喜马拉雅山麓南侧坡九万平方公里地区的情况。我们有幸对陈宗祥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陈先生首次对自己的人生、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做了回顾和总结，是授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访谈文章。

[**关键词**] 陈宗祥；民族学；《白狼歌》研究；《格萨尔王传》；南语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3—0004—15

作者简介：**陈宗祥**（1919-），男，汉族，浙江宁波人，民盟盟员，民族学家，我国最早介绍、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者之一。1940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兼学历史专业，1942年12月肄业于辅仁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部。1953年4月随四川大学民族组并入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1987年任宗教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初退休。历任辅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助教、讲师、副教授。**覃影**，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张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四川 成都 610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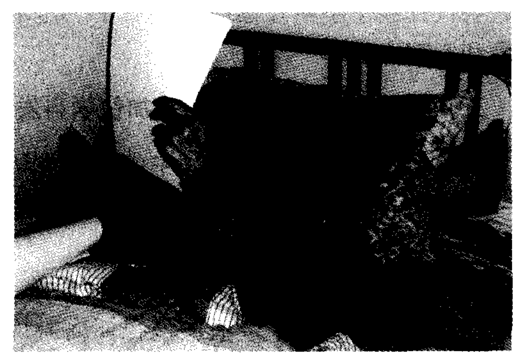


图1 2012年3月26日陈宗祥先生亲自审校访谈稿（张强摄于成都玉林村陈先生寓舍）

前记：2012年1月15日，我们受《民族学刊》"西南民族研究院成立10周年"纪念专栏之托，到玉林村拜访了老一辈民族学家陈宗祥先生。陈老思维活跃，说话中气十足，全然不像一位即将93岁的老人。几天前陈老刚刚出院，卧病在床，仍为我们作了两个小时的解答。2012年3月14日晚七时，我们再次来到玉林村陈老住宅续访。老人已对第一次整理的访谈录作了认真校改，并针对原先所提的问题，手写补充了李安宅、任乃强先生传授藏学的有关情况。

2012年3月19日上午11时，我们再次拜访陈先生，庆贺老人93岁的生日。陈先生这次扼要谈了对青年的盼望，我们也从谈话中了解到他有两次凉山彝族调查的经历，有两大工

程要做，基本理清老人一生的重要经历。

2012年3月26日上午10点半，我们对陈先生进行第四次访谈。陈先生和他的二女儿陈小珍老师已将二次校稿准备好，陈先生给了我们一张明代《松潘边图》、他的《明季<松潘边图>初探》论文复印件、论著目录一份、《古蜀建筑史研究》大纲一份、两幅插图（附本文）和对访谈提问的手写答复稿。陈先生在这次谈话中主要讲述了对古蜀国研究的看法，以及他与建筑工程师江道元先生的合作，这对古蜀史的研究将相得益彰，并再次强调对外国学者有民族学"伽利略"的提法持否定意见。2012年3月28日上午11时，张强完成对陈先生补充问题的采访录音。陈老主要谈到80年代和退休后的一些情况，认为80年代的教学经历也很重要，并对"民族走廊"进行了补充。

在近四十天的录音访谈和校订整理工作中，陈老不顾卧病在床，身体虚弱，仔细解答我们提出的七个问题，并借助放大镜认真审校我们每一次的整理稿，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与和蔼可亲的师者风范。访谈整理主要是根据陈老多次的口述录音和手写补充稿，经重新设计提问、分设若干主题归纳而形成，读者可以据此了解陈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及他的人生和治学经历，一睹他的不平凡人生所折射的人格魅力。



图2 2012年3月26日陈宗祥先生在与覃影博士交流

一、陈先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整理了您的论著目录，按发表情况，大致是解放前40年代的对凉山彝族社会、文化、制度的考察研究时期；1978年以来《格萨尔》译评、《白狼歌》研究的高潮时期。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您不同时期的治学情况？作为后学，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指导和教育学生的。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我们被调整在川大，后来王维舟院长，就是十八军的王老，他说这些老师搞了几十年民族学，摆在川大不对，还是要摆在民院。所以1953年3月，他又把我们几个老师与十几个学生调到民院。

因为我喜欢查书，大学的外文书又多，我关注西藏，已经在编康藏外文目录。我发现一查到中印边界东段，美国的、英国的书都把藏南这个地方抠掉，中印边界东段遭抠了。我说这个不对，于是就用打字机把材料打下来，那时没有复印机，打下来的材料就放到身上。当时夏康农副院长在负责民族调查工作，他问中国到底有好多个民族，大家就瞎猜，有的说一百种，有的说五十多种，有的说……，我就哼了一下，他们都朝我看，我就说还有不知名的民族。他们问我，有没有这个材料？我说有，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夏院长就叫我把下午安排的工作停了，先翻译这些材料，如果人手不够，再找玉文华（我们师兄弟）。翻完了，吴泽霖教授就看，结果一打印，不现字迹，等于白打。没办法，吴泽霖说，我们把原稿加上那张地图，一起送到费孝通先生那里。于是资料送到中央民族学院，他们进行了打字和整理。1953、1954、1955年就发生中印边界东段的事，人类学家海门道夫去调查写的一篇文章，恰好是我看到才翻的这篇读物。①[1]海门道夫出书了，书拿过来，吴泽霖又翻了。[2]这样中国才有了材料，包括喜马拉雅山南侧坡的九万平方公里地方，这里民族太丰富了，还没弄清楚。因为我搞西文编目，才搜索到这些资料。

1950－1960年，我的研究成果少一点，我本来可以写一大串，但1955年、1956年，我被肃反了两年。

我1957年被戴上帽子，1958年3月，我们这部分人被下放到西昌地专农场。1961年，我患水肿病，脸部和双腿都肿了，变成有两个粗腿的大胖子。西昌医院的医生专门检查我们，首先就看到我，他跟我说，医院奉上边的指示，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劳动。恰好地质学院办公室的邓文峰同志也到了这里，一聊起来，才知道他真是懂不少，不仅仅是语言学。之后，我向他提语言学问题，他给我解答，因为我对这些问题莫名其妙。我们不用课本，二仙谈道，就这么开始谈，我开始学，

一直学了十五年。后来，他说我的语言学问题多，让我考虑选题，我们俩共同搞，并嘱向场长请示批准。我在西昌图书馆借阅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册府元龟》，我亲耳所闻，这是我们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陈垣）最推崇的一本书。我抄下东汉时三首《白狼歌》，四十四句的译义与记音，抄写了才174个字，总共是三百多字，音、义都有了。我马上把抄下的东西给邓文峰，我想这个对找《白狼歌》原字的音有用，我们俩想搞《白狼歌》。当时，我们摘帽了（平反），都有了点时间，劳动也松多了。我就请示农场场长刘强辉，我和邓文峰没事想搞一搞学术，主要是《白狼歌》研究，请他批准。他同意了。后来，吃好一点，不劳动，我的病慢慢见好，而且《白狼歌》研究也有了进步。邓文峰懂语言，我搞历史，原先大家猜《白狼歌》是彝语，我们调查认为不是彝语。1964年，我调回民院继续工作。邓文峰的语言工作行将结束。我认为党夏珠同志提供的部落史资料，也该由我整理出版，把这两部分合出一本书。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白狼歌》研究（一）1991年第一版，得到学校和四川省民委的支持。现在又出了《白狼歌》研究（一）2010年第二版（增订版）。

还在华西边疆研究所工作时，1945年李安宅老师跟我说，有个机会去凉山搞彝族调查，让我停下手中的工作。我说，太高兴了。但我提出了一个意见，希望李老师能够给我找一两个导师。因为我一向跟他在学藏学，这下换个新的（彝学），我一点都不知道，要抓瞎。他让我即刻跟他走，去见的老师就是后来华西坝金陵大学（当时在成都）的马长寿教授。马长寿是搞彝族的，当时他在睡午觉，李老师把他叫起来就介绍。马长寿很高兴，他起来擦把脸，李老师走后，他就和我到小天竺街的茶馆去谈。马长寿跟我说，如果我定了去凉山，还有位老师就是冯汉骥教授，冯老师等着见我，让我去见他。冯老师是我熟悉的老师，听过他的课，这下要投他的门了，我说好。当时见面，冯老师很简练的几句话，说这次去凉山，什么叫黑骨头，什么叫白骨头，让我好好研究；说一半的对他都赞成，说错也不要紧，以后会改的，但是让我大胆地说出来。同时他说新西兰民族会系谱学，让我注意系谱。后来我没看冯老师的讲义，他说要用系谱的办法来慢慢地恢复历史。

从那以后，我就跟马长寿。马长寿的彝族书出来了，我的就出不来了。[②]

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红卫兵要抄家，他们来过七次，把我的一切弄的荡然无存。我一共有五本书被毁。一是我的两匣子关于康藏的外文目录卡片，我原来打字出来就已经是一本书了。第二本是"《全唐文》吐蕃资料汇编"，摘抄有六七十万字，这么厚，也给抄了，这两本书就毁了。第三本是我在凉山苦了三年，写完了横越大凉山的游记，这本书我没印。第四本书关于乌抛家这一支头的全社会、全支头的奴隶情况；最后一本书是十九个项目[③]的调查，背靠背的调查，我把这些资料都理出来了。这后面的三本书分别摆在三个地方，结果还是全部被毁。从这本《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研究》中，我查到1976年起，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调民院冯元蔚同志、徐铭同志和我，去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用去三年时间。本来由云南、贵州、四川三个省合作，云南和贵州都没来，最后四川省内各单位参加搞。当时民院调了三个人，我们院长冯元蔚是彝族，他当领队。我们调到李绍明所在的四川省民委，收集关于奴隶社会的资料，这书里边有我的东西。

我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文革抄家只有一本逃出来了。我把《格萨尔王传》稿本交给何剑薰教授，他拿到青海印了，这才保存下来。[④]这本书都是内部出的，标注"内部刊物"四个字。我想拿到北京或者天津，把它对外公开、正规出版。总是一本书嘛，而且是《格萨尔王传》研究最早的一本书。

我现在弄的东西全都在（双流新校区图书馆）综合馆，有一个专门陈列的展柜。包括四份原文敦煌古藏文的《南语写卷》，这本书还没出版，但是复印件已经在那。还有一本《格萨尔王传》（译著《岭地超人格萨尔王传》）、两本《白狼歌》（《<白狼歌>研究（一）》第一版和增订版）。

1980年没写作，因为我想休息。教务处长张汉成突然下令，让我准备《民族学概论》教材，他们安排我在最近一年或者两年上课。我说好。正是利用这一两年时间，我赶紧突击编《民族学

概论》。我一门心思在屋里编教材，什么都不管。

1982 年秋期，20 多个学生来听课。我首先请学生们告诉我姓名、族别和家乡地址，以便选两个学生去他们的家乡作民族调查。他们当中四川东边酉秀黔彭的土家族学生比较多，西边的少数民族学生缺少。四川的土家族跟汉族水平一样，很容易考上。但是我心中有数，只有一个普米族的学生，叫胡文明，当然就很看重他。因为，我让学生写名字，写族别，写家乡地址，就知道了学生情况。我每年暑期都要带学生上山，第一次选的两个学生，一个叫杨松，苗族，第二个就是胡文明，调查地点在木里县。那个时候县政府还能承担一些开支，学生不是普通伙食，和我一样待遇。这年夏季的 40 天，两个学生一个教师，我们工作得很好。我请了一个名叫董吉三的“汉规”，“汉规”就是懂藏文的、做过道场的祭司。在“汉规”的帮助下，我们的藏文熟练多了，我还有他的相片。后来换成了党夏珠。另外，我需要抽点时间告诉学生把问题写出来，再去写论文。如果感到材料不够，明年去家乡再做补充。如果发现有意义的文章，帮助学生略加改动，投交当地杂志发表，署名和稿酬全部是他个人的。

我自 1982 年讲授《民族学概论》，到 1989 年退休下来，八年一共带了 16 个学生。16 个学生里，发现三个有研究潜力的少数民族学生。一个是胡文明，第二个是梁丽蓉（音），女的，凉山彝族。还有一个是代刚，康定藏族，现在是研究员。胡文明、代刚两个成功了，梁丽蓉（音）也是个人才，她有篇论文写得好，很认真，我也认真地看，帮她修订，还加上《清实录》的资料。梁丽蓉是彝族，我就投给《凉山民族研究》了。

胡文明是我现在最棒的学生。他很聪明，领悟能力高。我们师生两个有缘。他不但普米语，而且彝语也特棒。胡文明论文也写得很好，我把它推荐发表在云南的杂志上，之后，格勒在北京看到又发了。因为那个时候，做研究的人少，真正动笔、动脑筋做出来的人，胡文明算一个。这次校庆（60 周年，2011 年 6 月 1 日）胡文明来了，我劝他说，《简史》（《普米族简史》）暂时不忙写，他写过两本。他应该把普米语的老大哥於弥［yu mi］语，於弥语就是西夏语，好好搞一下。我跟他说，他语言天分那么好，一口流利的彝语、普米语、汉语，如果搞一搞南语，搞一搞他们普米族的文献，这样他们就有 1500 种的宝贝，他穷其一生也翻译不到多少。他现在四十多岁，到我这个岁数，翻译出来三十种，就很伟大。而且他不是写简史了，改为写通史。我有五种西夏文字典，还有两种藏文的，他可以拿去，他们那里的藏文多，藏语多，懂得的人也多，可以多学点。所以，这个语言学要搞下去，对现在西夏文的研究，能起到重大的变革作用。不要只看到我们现在是起步，黄布凡[3]教授的音位系统抓下来之后，就不得了了，因此这是关键阶段。

另外一个学生叫代刚，他是刚成立甘孜州民族研究所就去的。我跟他说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把它们收集起来，他的甘孜州史就成功了。一是《格萨尔王传》那部书提到，邓玛岭土司取邓柯（现在划归德格县）为中心建的岭国，其实就是隋代的附国，而且以道孚县北为界。我翻译的《南语》也说到隋代的附国，一字不差。任乃强老师对隋代附国也有研究。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康定。木雅（Mu Nia）、西吴·杰布，其实是两兄弟，木雅是哥哥，西吴是弟弟。木雅到这儿没多久，西吴就掌权了，由康定一直到云南的宁蒗，到四川的木里这一带地方，都属西吴王辖领。代刚有篇文章关于“木雅”（Mu Nia），“木雅王”的记录，我给他修改，增加一点资料，发表了（代刚《康定“木雅”藏族部落历史初探》，《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3 年 1 期）。后来格勒看到，又给他发表[4]，同时推荐他到的甘孜州民族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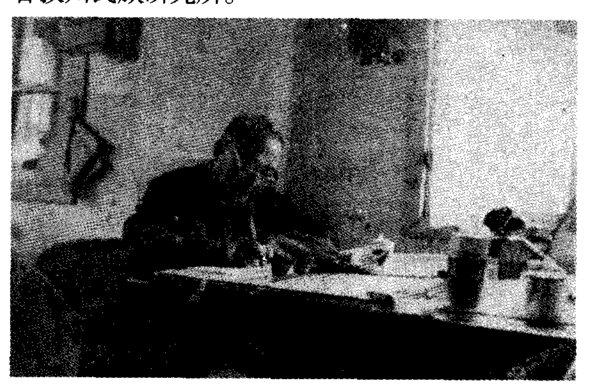


图 3 1987 年陈宗祥先生于成都玉林村寓舍（照片由陈先生提供）

1988年秋，张汉成又找我，让我用外文向本校留学生讲授“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计80节课。于是，我把手上有的论文，先行译为英文。其中有：文学，如藏族格萨尔王传，彝族洪水故事等；宗教：藏族各教派，彝族的毕摩与苏尼；天文学：二十八星宿研究，藏族的，普米族的，纳西族的。其中，我翻译自己写的彝族宗教的那篇论文，打印并配图，因为外国人讲究图，到意大利又发表了。我还得了个荣誉衔称——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就是通消息写文章的院士。

1989年开学，20多个留学生到校了。他们分别来自菲律宾、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国。德国留学生还是个专家，他先到拉萨，然后到成都来听课。我不知道，还在讲拉萨的风景如何好，他底下在笑，说我可能没去过，他们已经旅游回来了。后来可能有机会去了，我等了一辈子，现在有高血压，仍没去成。我这80节课等于大考一样，晚上打字备课，必须要打两页纸，才敢上去讲。我有时忙到深夜，我的爱人就睡在这儿，我在那儿打字，她也忍耐了，没办法，知道是工作前途。最终这个事算过大考了。

1980-1988年，美国普几桑德大学与四川师范大学挂钩，每两年派一个旅游班来成都学习。每个旅游班大概有30多个年轻人，聘老师给他们作报告，只讲两小时，自己拟题讲座。川大有人讲考古，我讲藏画唐卡。我弄些画报，在墙上都铺满了，他们很感兴趣。我共去了3次。

1989年因感于年龄增大，身体虚弱，向领导辞去职务。退休后，民院每年暑假都办一个旅游班，找我们老同志去讲，我去了大概两三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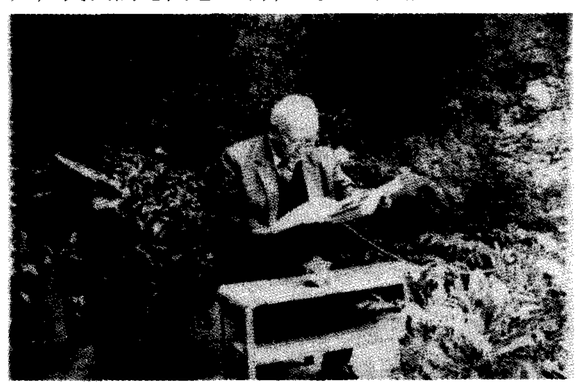


图4 1989年陈宗祥先生退休后于木里县向党夏珠核对《南语写卷》的翻译（木里县周明藻先生摄，由陈先生提供）



图5 2003年陈宗祥先生于成都玉林村寓舍（照片由陈先生提供）

80年代正是学术发展、向高处走的阶段。但是由于我健康和年龄的原因，就没往前走了。

二、陈先生您祖籍是浙江宁波人，出生在北京，您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吗？我们知道，您本科是辅仁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兼学历史专业，您当时研究的是什么，后来为什么研究民族学和人类学？

我父亲是农民家庭出身，他13岁就想往外跑，不想当农民天天插秧，而是想学做西服。因为我们浙江东部西服业非常发达。他拜了一个手艺不错的中国师傅，之后，随师傅到日本东京去。当徒弟的他就一面学手艺，一面干杂事。当时，刚好遇上东京大地震，把父亲吓坏了，他又跑回宁波乡下。他无功就回来了，什么也没学会，白去一趟。所以，村里的小孩开玩笑，羞他，讽刺他是“回汤豆腐干”。[⑤]我父亲又有心思了，他考虑跟一个要去天津的师傅，到天津去发展。他在天津三年满的师，然后自己到北京去发展。我的奶奶又陪着我母亲到北京，1919年3月我出生在我父母的一个小作坊车间里。我家里有七个姊妹，我是男的老大，排行老二。我父亲会剪裁衣服，他在外找顾客兜揽生意，把材料弄回家里来做，我母亲也帮帮忙。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工厂也就慢慢扩大。在王府井父亲开了一家店子，店子前面卖材料，后面是小工厂。他很羡慕读书人，他自己没读什么书，13岁跟师傅到日本，但没有什么学问。他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读书人，对我们的要求就只有一句话：你要好好读书。

后来发生这么一件事。我起初读私塾，后来到正规小学念书，我小学跳了一级，没读四

年级，当时只有三个人跳，我是其中之一。校长跟我说四年级不要读了，干脆上高小。跳级之后，我考上了中学。我正要去中学交学费，父亲来了，他跟我说不念这个中学，还是去念小学。我听他的，他怎么说我怎么干。他把我领到汇文小学，汇文小学是个戴帽子的教会小学，[⑥]因为那里英文棒，多教几个小时。他让我念这个，英文学起来快，而且我毕业可以念汇文中学，这里原来是燕京大学的底子。他对我们的教育，就只有一句话：你要好好念书。一个父亲的老客户——北京化学公司的经理建议说：子女最好送南开大学读化学，读化学可以制药，制药最容易发财。他听进去了，就让我的弟弟、妹妹念南开。他们两个南开毕业，现在也是搞制药。所以这些反映了他的思想，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后来就不沾这个买卖，对这方面没兴趣，甚至还离开了北京，我有个兄弟念辅仁大学的经济学，后来家里是他接的班。

我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起初我想考地质学，没考上。我看榜时，教务处的老师找我来了，我说还没定是历史专业，还是别的什么。老师让我慢慢选，又说心理学很有意思，老师教授齐全，仪器齐全。包括体育 1 个学分，共需修 14 个学分，我只念 13 个学分，就能升级，叫我不妨试一试。然后他让我再问问系主任，还可以选什么，最后决定加不加入心理学系。我见了心理学系主任，告诉他我本来是考地质学的，辅仁没有地质学，若有古生物学，我想读古生物学。他让我到生物学系主任那里了解，如果有古生物学，我选修一学年就可以了。我说太棒了。我就赶紧到生物学系主任那里去问，他说由于系很小，没有设立古生物学。然后我又跑到社会学系，他们说不论我念人类学，或者社会学，都很欢迎。我在历史系选了中西交通史，在社会学系选了人类学。越学越有意思，越学越有兴趣。那个时候心理学的确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也是慢慢把心理学对付下去了。辅仁毕业的好多人都当心理学研究所的所长、研究员了，有的还到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卢沟桥事件时，我想等等，看看辅仁还办不办学，于是，我们两弟兄就跑到天津租界了。后来说办，又继续读心理学。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我才决心不再等复学了。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唐宋四大家的天才分析》（英文）。因为唐宋八大家人太多了，我做不下来。我写的是韩愈、王安石、苏轼、柳宗元。在熟读这四大家的历史传记的基础上，为每个人画一个圈，这个圈按照几个心理特质等分成相应的几份，并分别评分。比如韩愈的勤奋怎么样，聪明怎么样，记忆怎么样，活跃怎么样，各打多少分。做这样的四个圈比较难。论文的结论是爱迪生的名言：天才等于九十九分的勤奋，加上一分的灵感。结果我的毕业论文得了第一，还存在着，有老师看到，还提到这论文。毕业后，我在辅仁找工作，最后到了社会学系，他们内部都知道我是人类学的，不是心理学的。

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我的探险生涯》，对我有影响。我中学时尽是念些杂七杂八的书，像《库克船长》、《哥伦布船长》这类探险的小说。斯文·赫定多棒！我说他能干我也能干，我也可以学地质，学藏文，将来也可以到西藏，到新疆去发展。

我在辅仁继续念研究生。写论文没有东西不行，于是就做收集《全唐文》有关吐蕃的资料汇编，每天没事就抄。1941 年 12 月 7 号，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全部关门。美国的系统完全关了，在京大学就全关门了。我下决心到成都，不等它复学。我跟父母商量，自己已经是研究生了，成都也可以研究，老师都在那。父母同意后，我就赶紧办了来成都的事。我那时新婚，但不要紧，我想先去成都探探情况，看能不能养她，然后再派人把她接过来。辅仁后来复学了，有些不能动的不能离开，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可以离开。像发现周口店北京人的裴文中，他就到了辅仁教书。还有搞西夏的王静如，这些不愿意走的知名之士，全都到辅仁去教书。那个时候也是够热闹的。

三、陈先生，您来到四川生活和工作，据说是顾颉刚教授 1942 年介绍您到成都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师从任乃强、李安宅研习藏学。您曾说过："我一生在四川省生活、工作的时间最长，应该是四川人。"对于您由北京

来四川这段机缘，我们很感兴趣。还有，任乃强和李安宅当年是怎样引导您治藏学的，对您后来的治学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1942年9月15日，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赴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报到。李安宅是社会学系主任，当然向他报到了。我去的时候恰好只有李先生一人，谈话很顺利。我把顾颉刚先生回复我的一封信转交李先生。当时，顾先生是在国民党的重庆组织部，[7]他对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前途很是慎重。说不要来重庆，这是政治的地方，让我赶紧投奔李安宅先生，他刚刚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正需要人。我拿着这封信给李先生看。李先生读完顾先生的信，笑了，说顾先生不叫我介入政治，叫我投奔到他这儿来，他很欢迎。李先生只看了那封信，就定了我到华西工作。他跟我说，时间很紧迫，冯汉骥教授要上课了，叫我去听课。说我学人类学的，去听听他怎么讲。听完了，一个小时到他那儿去，他给我找办公室，领我去华西边疆研究所。为了不让于式玉（这是他爱人）、玉文华（那是我的师兄）和我三人耽误第一课，他让我们赶紧去听，我们就去了。下来之后，他领着我到教育大楼，就是在总的办公大楼的后面，马识途先生经常在那儿办公。马识途是搞教育的。我们在教育大楼分了一间房子，作为华西边疆研究所办公室。他让我在这儿办公，坐在这儿。又问我都学了些什么，搞了些什么。我就谈了两点，一是在大学期间，我已经在搞国外的西文的有关康藏的目录。二是做收集《全唐文》有关吐蕃的资料汇编写论文。他跟我说，还是搞外文的，这个需要的很，既然已经开头了，就接着做下去。

李先生如何帮助我治学呢？一是启发性的座谈，再是抄东西，第三个就是听他开的“社会学原理”课，了解他系统的学术思想。当时冯汉骥先生在讲“人类学原理”，我这两方面都听了，对我帮助很大。

李先生又是怎么传授知识的呢？他采用了牛津、剑桥熏陶式的座谈。李老师坐在办公室抽着烟斗，没事就跟学生摆龙门阵（聊天）。他要求每周一次，说假如他在办公室跟人谈话，让我们转身就走。没有人的时候就进去，时间一个小时，超过了也没关系。这样得到很大的好处。他等学生提问题，再启发性的把他的看法告诉学生。这样直接又快，对我们的脑筋开阔很有帮助，很解决问题。比如，我就拿《格萨尔王传》英文本和我的译稿过去请教他，我说这段翻译，不太理解。但是，他一看到题目译名，就说这个题目不行。我不知道这个Gesar怎么写，反正他不同意。他说我给你想想，他提了五六个，最后他用了“格萨尔”这个译名，“格萨尔”其实是他想到的，由我写出来发表，但问题得到了李先生的帮助。[8]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场合解决的。

李先生既是社会学系主任，又是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所长，比较辛苦。当时，国民党交通部的部长、华西董事会的董事长张嘉敖提出：要办一个华西边疆研究所。人找到了，什么也弄好了，却不知道张嘉敖是去了美国，还是怎么了，他人一走，经费就没有了。但是李先生咬咬牙，跑经费，到处去求援，整天为了经费而着急。他这样很苦恼很忙，既要教学生，又要管研究所，也有自己的东西要急于写出来。他刚开始是搞宗教，每天要等华西坝没有人了，才写东西，有时候搞到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在办公室睡觉。他的稿子没人誊，拿到我那里，让我给他抄。我很高兴，一方面先睹为快，一方面又学习藏族宗教的精髓。这样慢慢的抄，慢慢的学，对我很有帮助。

1943年的一天，我们单位突然很热闹，来了四个著名教授，他们一起来报到。我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自己的偶像到这个所里来了。第一个就是任乃强老师。任先生很艰苦，南充人张表方（张澜）帮助过他。他曾经徒步到北京求学，从成都出发，到秦岭，由秦岭到西安，由西安走到北京。这锻炼了他的地理学实地考察，他又喜欢历史，历史地理非跟他学不行。他与新龙土司的一个女儿（罗哲情错）结婚，他的儿子叫任新建。任先生特别对西康的、甘孜州的历史地理有研究。因为他进去西康很早，李鉴明老师一面当喇嘛，一面还在研究，就把他所有知道的东西，如数的告诉了任乃强先生。任先生笔又快，都把它记下来了。李鉴明跟任老师传下来的资料，准确性高，我后来翻译《南语》相关问题有证实，所以很钦佩他们。

第二个是谢国安，藏族，甘孜州的绒巴岔人，基督教徒，非喇嘛教。他会英语，藏文精通，我向他请教藏文，他几个字节都能给你写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谢国安的女婿刘立千，98岁去世。刘老师所有的书已完全公证，送给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还印了一套全集，在我们民院的后街全都有卖他的书，我去买过。谢国安和刘立千对世界都是有贡献的，世界好多学者，比如加利福利亚大学的雷兴（Lessing）教授都来了，有什么问题都问他们师徒二人，他俩把材料写了，别人利用他们的资料发表，都要感谢他们，所以他们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最后一个是刘立千的爱人，谢国安的第二个女儿（谢建君）。这家人真是人才，就住在小天竺街。后来我就不寂寞了，有时任老师回家，我就找他们摆龙门阵。所以对我们后学，真有帮助。我的运气太好了，机会太好了，尽是一流的教授，因此脑子里随时记着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华西边疆研究所很出名。

在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的政策是：我们没有钱出杂志，就利用国民党的杂志《康导月刊》，还有蒙藏委员会的《边政公论》；我们没有经费，就利用国民党的单位。1944年李先生让我去的马边“边民生活指导所”，⑨就是他接的这样的单位，说我们利用它当实习的地方。我是第四任，这样到了小凉山。我在任三年，每年夏天总有一个学生来。1945－1947年，我曾横越大凉山。[5]1948年因为联系去耶鲁大学，我就到了上海，没有事做，只等着李先生的消息。李先生当时已经在美国，⑩[6]他在给我办奖学金的手续，耶鲁人类学系主任欧兹古是他的师弟，他们同班感情很好。李先生去耶鲁就是欧兹古给他办了一个美国海盗学会（Viking Society）的奖金，这必须由美国人帮他申请。但是，那时我的情况没办法解决。这事原来非常容易，因为美国每年有好多奖学金，它都有一本目录，随便找一个奖学金，很简单的。然而，我要走的时候，已经停战了，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回了国，都想弄一个奖学金，到国外大学弄个学位。这么多的申请名单，奖学金分不到我了，所以李先生说这次真是没办法。⑪[7]后来我心想不去美国也没什么，我已经接触很多像李先生这样的老师，比如冯汉骥老师是哈佛大学的，李安宅老师是加利福利亚大学的，这个精神我已经吃透。

李先生还有一篇很重要的“祖尼（Zuni）学派”的文章（《印第安人祖尼的母系制度》（英文本）），太有意思了。这篇文章里，他介绍一个一个名教授之后，总在这个人的后面说两句不客气的话。他大概介绍了六七个很有名的教授，介绍他们这么好那么好，但是在最后一点上，点中要害，实际上他持批评意见。所以“祖尼学派”成了美国人类学系教科书的材料。这是后来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来学校（西南民族大学）开会，我们谈到李安宅先生时，他告诉我的。现在我这儿都有李先生的文章，因为曾经给李先生编书，他的文章都经过我。不过我也有遗憾。我在整理李先生的行装，十四口大箱子图书的时候，恰好翻到了一篇文章，这是在国外杂志上写的抗日政论，言辞正义的加以反抗。我跟他十几年，没看到他写过这类抗日的政论，可能因为身份的问题，他曾经是党员，后来脱党了。他避免谈这些，跟我只谈学术，这方面只字不提，学术就够谈的。我说将来把这篇抗日政论附上，一起汇编到他的书里，但是很遗憾，现在找不到了。李先生的稿子没收干净，关于祖尼的十二篇文章，送香港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版。另外，还有一本研究藏族宗教的书（《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也不知道是否出版。因为，后来李先生的家属来了，用不着我协助了。

李先生从美国一直到英国伦敦，买回来十四口大箱子的书，全是国外的书。这些箱子堆起来比我现在的书房更长更高，取书需要弄上架子。李先生自己没时间念，我有一年的时间在堆箱子的房子里，其实我在念。这一年我简直高兴极了，这都是最新的图书！《南语（Nam）》就是他的书，我当时念的一头雾水，不懂讲什么，但是我记住了“Nam”的书名。我研究《白狼歌》之后，听羌族人背诵系谱，一开始就是“南喀”，羌族由母系转入父系，他们的第一个男性远祖名字就叫南喀。南喀是“天”的意思，推测南喀为“Nam”的音记。我把这个研究写成专文，也出了书。但我还是奇怪，忘怀不了。后来又碰到《南语》一书，我

就抓住不放，慢慢的研究，慢慢的解决了⑫[8]。

四、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白狼歌》的研究，提出“白狼语－南语－西夏语－普米语等一脉相承”的重要见解，被认为是对南语研究的一大突破。这是您综合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跨学科取得的成绩。您如何思考和找到解释这一历史语言一脉相承的方法，并且如何实施历史语言学的田野调查的呢?

我是《白狼歌》研究起家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我在搞古蜀史。这是当时进去凉山三年，川大冯汉骥教授亲自指导的、最关心的问题。大的任务搞了68年。当时没解决，我也奇怪。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黑部落不是单独的，白部落和黑部落他们的分布有重叠，黑的是主人，白的是奴隶。他们都忌讳这个问题，黑的忌讳谈，白的更忌讳谈。他知道也装不知道，对我问的问题，他就装傻，不说。

后来还是《白狼歌》解决的。我们起初对《白狼歌》的调查，原来认同白狼语是彝语的说法，但是拿它跟凉山彝语四个方言对音，还有参考贵州大方彝语方言的《西南彝志》，都对不上。我们否定白狼语是彝语，之后，又与纳西族语言比较以后发现，纳西语也与白狼语不合。我们又调查发现，与纳西族错居的自称普米的民族，普米的含义就叫白人。我当时说普米语与白狼语对上了，没想到又碰了钉子。⑬

我在调查白狼语的时候，偶然碰到一个普米族老汉。他是木里土司衙门的把总，叫杨德福。我已经调查到他的身上，他到医院我也跟到医院，寸步不离，请教他。我说，想跟他学两千年前的白狼语，请他帮忙看看整理出来的《白狼歌辞》。他推辞不掉，看了就到旅馆，我也跟去问他，第一句、第二句讲的是什么。他说：哎，你老先生白费，搞错了。他说，他们这里普米语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街上的普米语，一种叫於弥［yu mi］。⑭因为我运气好，碰到杨德福说的普米族的古语於弥了，於弥正是西夏母语，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我在这篇文章（《“於弥”为嗢末部落试证》，收入《白狼歌》研究（一）增订版附录）中，谈了这个问题。於弥是奴隶部落，吐蕃的贵族就欺负人，他要打某个部落了，就把这些部落的青年都调去当兵，让於弥部落搞后勤。有一部分於弥部落的人就逃跑，跑到木里的三个小乡。

杨德福说现在说於弥话的人，大概还有几百人。我中学高中生时，曾经惋惜《甘肃日报》说的有个会说西夏语，懂西夏文的老头死了，他们认为西夏文已死，西夏语完全变成死语言。不然，不然。我碰到了普米族的於弥语，它是西夏母语。我就求杨德福教我，跟他套近乎，说他既然把我的结论否定，他说的就是准确的。后来，他给我介绍了西昌民族干部学校的党夏珠同志，我们从此结交，成了几十年的朋友，可惜，他先死在我们的前头。现在我把他的儿子党瓜珠请出来，黄布凡教授已经跟他见面，工作了六天，黄老师已记录两千词汇。一般必须要达到六千词汇，她才能归纳音位系统。党瓜珠学过9年藏医，藏文特棒，但是他的於弥语，我担心受影响了。

这说明於弥语还活着。木里有三个乡，一个在前所，一个在后所，再有一个是牦牛坪乡。⑮我看地图上这三个乡，正是窝心。解放前由成都到木里去，骑马要十五天，由木里到大坝乡（现在叫牦牛坪乡），走路要三天。木里很偏僻，党夏珠的组人就住在牦牛坪乡，他的小组叫堡堡组。

民族学很注意这个问题：住在山窝窝里边，卡在山沟里，跟外界不来往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永远没变化。但是，普米族男子说话变的厉害，普米族老婆婆变的不厉害。有的语言是老婆婆给我解决的。普米男子听不懂我的拼音，我拼音也没错，他就喊老婆婆过来听。这个老婆婆一听“啊哈哈哈”笑了，她说，这句话说：“我想啊，我想不嫁给你”。我后来每次翻译到这儿，老想到这个老婆婆，她说：“我想嫁给你，但是我不愿意嫁给你。但是呢，我还是嫁给你了，我跟着你走。”就这么一句话：我是不安心，不愿意，不喜欢你这个人，我不愿意嫁给你，但是，我还是嫁给你，因为社会家庭的力量，逼的没办法，只有嫁了，才嫁出去的。一个在盐源，一个在木里的两个老婆婆帮助了我，后来男的就不找了，我就直接找这两个老婆婆。这就说明问题了：调查研究语言，有的地方闭塞，语言不变，围绕锅庄转的女子，她没有、不跟外界接触，她的变化很少，所以她把语言保留下来。

党夏珠有一肚子的历史。他就慢慢倒出来，倒到我这儿。他在我家住了 15 天，把《白狼歌辞》检查了第一道。他从头第一句一直到末尾，又再给我来一遍。他这一来调子就定好，我把《白狼歌辞》的章数也分开，意思也懂了。只是文字还有点错，于是我查字典。一查字典都有，慢慢，慢慢地，才算理出来。

我碰到《白狼歌》，也碰到了这四大件敦煌古藏文的《南语写卷》。敦煌藏文卷记有时间。它的第一大件是 757 年以后写的，因为它涉及到 757 年的一件大事，历史上普米人逮到并杀害了唐王朝一个西昌的总督（叫杨廷进）。这件事《唐书》上一个字都没有写，然而《南诏德化碑》和《南语》写卷记载了这件事，我就根据《南诏德化碑》中的 757 年，这么推出来的。所以南语里面有很多的材料，汉字都没有记到，不但涉及语言学的材料，还有我研究的历史材料，有很多篇，深的很。

当时我还没有翻译完，很按捺不住，马上写了论文。这个题目叫：《隋唐婢药（附国）历史研究——兼论该国为＜格萨尔王传＞重要史料来源之一》。因为它又涉及到《格萨尔王传》第一卷的问题，说我们藏王如何如何勇敢，打下天下，建立岭国。反正只要有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老百姓必然要记到，必然要传出，口耳相传下来，《格萨尔王传》的确有根据的。但是，难免不会张冠李戴，它把藏王戴到松赞干布的脑袋上，当然不对。而且岭国比吐蕃松赞干布的时代早，松赞干布是唐代的，但岭国大致是 581 年到 618 年的隋代，涉及到很大的国家。它是以邓柯为中心，直到道孚的北边，恰好《南语》卷子写到。任乃强老师也写了，他根据李鉴明说的：去道孚的北边，青海的腹部安多，这个地方都是附国传记载的。这个《南语》卷子里面附国叫 hbe hbah，附国的附字，不读 fu，我们汉语声韵学，读为 biu，当时它不能读 fu，fu 是后来变的。原来用这个“附”音读为 biu。跟藏语的“附”完全一样。这样历史可以推倒重写。我这篇文章就写到《西藏通史》里，北京藏学研究中心把它发表了。

因此，南语涉及到《格萨尔王传》，比如，《格萨尔王传》萨当 - 姜这个国家。姜岭大战，姜国跟岭国大战，南语书里谈的完全是姜，姜是藏语。“姜”，藏语里念 hldyang，这个字整个拼起来，叫楼头，烧当即读萨当，指康定南边的沙德区。康定的南边一直通到木里，通到云南的宁蒗县。宁蒗有个永宁区，永宁区叫作楼头赕、萨当。楼头国在藏语里变成姜国了。我也写了文章，还没发。

古蜀国历史研究很重要，也很难。我不过是增加民族学的乌牛白羊两系，当年冯汉骥老师嘱咐的，我在搞这个。黑和白寄托在蜀国国王的身上，这个思路不错。但是具体是哪一个，就说不清楚，有困难。我正在搞鱼凫王，她来自何处，怎么到的三星堆，但问题是中间有个大窟窿，没材料，这个要命。其实青铜器材料多的很，三千多年、四千多年，殷商的青铜器上有铭文资料，必须有专家帮忙。假如我学一学甲骨学、青铜文字多好，就不被卡住了。

陕北渭水河是一个古老的地方，传说姜太公在那里钓鱼。那里有两个系统互相婚姻，之后，其中一个就走入民族走廊。我国华西民族走廊是研究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很重要的地区，北起陕西、甘肃省分界地区，通向甘南，直达四川南坪，又通过松潘县，南下茂县、汶川，再行南下至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抵达康定。以上一段路程，考古学家称之马家窑文化，下分三种类型。即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马家窑类型。但是夏鼐先生则略有更动，夏先生认为半山、马厂类型接近，他把这两种类型文物归为一类，即马家窑类型、半山 - 马厂类型。据陕西文物研究所石兴邦主任认为，马家窑类型的文物不是出于墓葬，而是出自家庭废墟。彝族自古施行火葬，我猜测马家窑类型与彝族有关，是黑的，半山 - 马厂类型是白的。

民族走廊一直通向缅甸。伊诺瓦底江的江口仰光的旁边，有个城叫普米城。普米就是这个普米，迁移到那里。关于民族走廊一直到缅甸这个问题，我们写了文章，发表在《白狼歌》附录上。[16]有人说白狼语在缅甸，本来我也不清楚，读英国人哈威写的《缅甸史》，我有些莫名其妙，他也没弄清楚。我研究发现，事出有因，白狼部落的确迁徙到了缅甸，没有瞎说。现在的缅语字典里，包括普米语。南诏把缅甸的三千个统治者抓到昆明，之后，配隶插队，这儿插一个那儿插一

个，完全把亲权割裂开，没有父母子女，完全破坏血缘关系。于是，这三千人很快被改造。南诏这个方法太厉害了。普米人都经过南诏的统治，多年之后，很多普米语就融进去缅甸语中。缅语字典也就包括大量的普米语，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字典，把白狼语查出来。还有什么话好说呢，的确这是缅甸语，但事实上是融合了。南诏把这黑的三千统治者压迫之后，加以融合改造，改变成为缅甸人。所以缅甸历史也就清楚了。

我在研究鱼凫王。西北有个地方有两个部落，一个叫鱼，一个叫水鸟。水鸟他们叫凫鸟，鱼凫的鱼跟凫，它们是两个部落，后来凑成了一个部落。鱼凫部落中有人当王了，蜀王中一个很重要的王。比如说这个“鱼凫”，林向教授和高大伦院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他们在这次（2010年11月13日在成都市温江区举行的“鱼凫文化高端论坛”）会上，轰了一炮，说这个鱼凫就是第一个蜀王，这夸大了。但是他这样夸大很有影响，因为鱼凫很重要。我就在搞鱼凫，鱼凫的困难在于它有个空白，一个大洞，不知道怎么填充。鱼凫是在渭水河北部的，根据水鸟，根据鱼，这个线索找到了。除了金沙和三星堆之外，已经发现有鱼凫王城址在温江，所以他们认为温江大有希望，就大量的发掘。我们四川的金沙、三星堆以及温江，都有可能再出现鱼凫王大量的痕迹。一个在陕西西北五千年，一个就在四川，相差大概一千多年、两千年。鱼凫王一个人要占两千年，这个就有原因。它不可能是一世，可能是多世，所以每一个王，后头都带着小尾巴。蚕丛王大概是三四百年，柏灌王大概也是两三百年。我的看法是她们还处于母系社会，那个时候还没有转入父系。母系社会不是父子连名，主要是父系社会用父子连名，母系社会没有转世，大体一算，沿袭部落名就了事，所以就有一个人要占两千年的鱼凫王。父系则有年代，羌人转入父系的第一世叫南喀，第二代叫巴拉。巴拉，白狼。白狼又拼读为藏文Pram，音读颚化以后，又可以读dzang，札。第三世，多，就是“好又多”这个多。成都这个地方也叫多。“多”这个地方产生了三个地区，一个在青海的腹部叫安多。另一个就是四川的平武，他们的白马藏民自称为多。第三个就是西昌的冕宁，就是多区，这个我们搞了。平武是介绍一个川大的德国留学生去的，[9]他研究金面具、跳舞。他在教书，是讲师，大概在教考古学，教中国的玩意儿，很吃香。

鱼凫在三星堆、金沙遗址，可能在温江还会发现，清华大学的李学勤老师、西北大学的张懋鎔教授和我是坚持到底的几个人。张教授可能60岁不到，精力充沛，材料在他身上。他在《考古学报》登出来的这篇文章（《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2005年第1期）中，列了一个青铜器表，而且标明某一种青铜器属于黑的，属于牛首，牛首器大概有三十多件。张教授说西周的青铜器太粗糙了，比不上殷商的青铜器，可能有两个系统的不同。他说对了。他用民族学的二系，加上青铜器的研究，就有两个系统了。我们交了朋友，他要我的东西，我就全部交给他一套。

我现在还在写一本《牛首与羊首－古蜀史初探》的书。这本书是1944年动手的，随时调查随时就写。严格说有二十多篇属于黑白两系，我预备再写二十篇，就交卷。四十多篇这么厚，但是起码要两年时间。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精力没有了。这些材料里面有我的那个系谱，就是汉藏语系民族与牛羊二系的对照表。[10]我梳理的这个乌牛白羊双系，它对我研究四川古蜀史，帮助很大。我搞广东沿海的苗瑶族系，是受好朋友建筑工程师江道元的邀请弄的，结论是苗瑶属于彝，他们是牛首，牛脑壳。牛脑壳就是黑牦牛，它是图腾。黑牛，彝族叫牦牛，纳西族叫牦牛，苗族叫水牛。白山羊，必须是山羊。侗族还有一个叫岗（音），有个图章印出来叫甘，甘肃的甘，叫丹族。这个丹族，我想可能是羊。因为白海螺叫dung－dkar，这边山羊叫白的叫东噶尔（音），读音相同。还有壮族，这边叫宗喀，他那边也叫宗喀。所以我想这两个族是羊。苗瑶崇奉伏羲、女娲这两人，伏羲、女娲是牛脑壳，伏羲的一个图样，上边一个牛首，底下一个穿袍子的男生，他也是牛。

五、您翻译了很多国外学者的著作，除彝学、藏学外，可以谈谈您对国外民族学术的看法吗？对于学术传承，您对后来人有什么期望？

我主要关心两大工程。一个工程就是，有个叫莱维 - 斯特劳斯（Lévi - Strauss，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人，他是结构人类学派很出名的人物，三年前一百岁死的。他的东西很丰富，而且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关键的问题，就是否认两系的说法，他利用天主教神父的材料，写了一本书，强调说没有。因为民族学有人认为有这个黑白两系（乌牛白羊）的说法。没有就说没有嘛，他还荒唐的很，说天文学出了伽利略，民族学、人类学也出了“伽利略”。他说，现在欧洲有一个人叫里弗斯（Rivers），里弗斯是“伽利略”，他就坚决不承认有两系。斯特劳斯还说莫斯（Mauss）是牛顿大师。“伽利略”的问题真是荒唐，学术界不应该有这种味，不应该沉默。我预备写文章，书查到，已经找出材料。[17]我搞的恰好是有两系的，正在写作中。这是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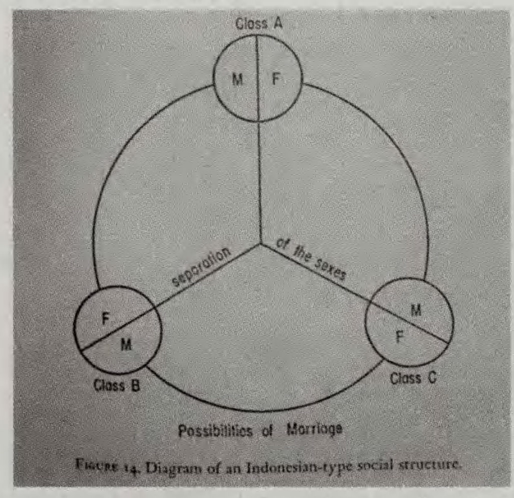


FIGURE 14. Diagram of an Indonesian-type social stru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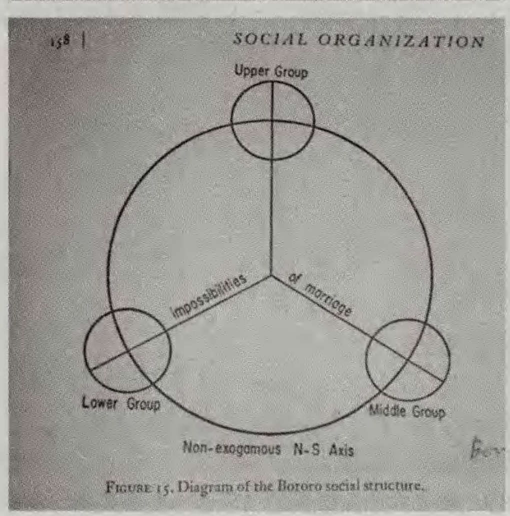


FIGURE 15. Diagram of the Bororo social structure.

图 6 - 图 7　三系部落婚姻关系图表

图 6 婚姻的可能性（以印尼部落类型的社会结构为例，表明三个部落两性男女之间的婚姻方式）图 7 不通婚的北 - 南轴（以 Bororo 部落的社会结构为例，表明三个部落中，第三个部落（Lower Group）不可能与第一个部落（Upper Group）通婚）

（引自 Claude Lévi - 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63，pp. 156，158.）

这个材料是天主教的两个神父做的，Bororo 是南美的一个小部落，书上有介绍。斯特劳斯利用神父的资料搞的这个东西，产生三个部落，第三个部落跟第一个部落不通婚，不通婚就等于没有二分族制，没有两个婚姻团体。他否定了二分族制。这是第一。但是，如果一个部落分化成两个部分，不通婚，男女怎么办；不能通婚，但等一下，它会变化的，可能会通婚的。这么简单的道理，这说明他的幼稚。但是斯特劳斯不管，他就下结论：不通婚就等于没有二分族制。第二，他紧接着把里弗斯和莫斯提升。但他也没说原因，没说结构学派，只说，我们这个民族学应该有“伽利略”，里弗斯可以做伽利略，莫斯可以做牛顿。

他跟恩格斯的观点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由北美加拿大到北美，到中美，一直到南美火地岛的印第安民族，同一个民族，他们彼此语言听不懂，风俗习惯本来有一定的特点，现在看不出来。民族学就不能用了。我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如果要查历史，斯特劳斯说只能查到一点。就是从加拿大起，有个熊部落。[18]我们中国的是白山羊和黑牦牛部落，一直通到伊诺瓦底江的江口，快下海了。他说没有历史可查。就是这么一个理由，多了一个部落出来，这个部落跟其他部落不结婚，他就说没有二分族制。

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最后一个工程—第二本书（《牛首与羊首 - 古蜀史初探》）出了，就算结束，封笔了。目前成都考古文物研究所在发掘温江，每年这么厚一本发掘报告。现在把精力都摆到温江，用锄头挖蜀国。我认为希望很大，他们走对了。所以我也在准备完成这本书。那么我就留一句后话，我把上面这两个问题提出来，作为对青年的盼望。

钱学森老师提出问题，为什么大学培养不

出来全优秀的人才？就是学科分科太多，一来就给你弄到框框里去了。我不同，我在辅仁大学，就只念14个升级的学分，其他就念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社会学系人类学、民族学，就都搞这些去了，结果你看，我一出大学就留在社会系。这个兴趣就要多，我的兴趣是广泛的。

我对于国外研究我国的藏族、云南的独龙族、傈僳族颇感兴趣。那就是说首先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继而对孟加拉分会 Bangala Branch，中国上海亚洲分会等分会均分会杂志；此后，对德国天主教主办的《人类学》Anthropos，《华裔学志》Monumenta，意大利科学院办的《东与西》East and West 等杂志，都喜欢。通过对世界民族学史的学习，才知道天主教教规规定，传教的神父都有责任弄清当地民族的风俗和语言，并为罗马教皇博物馆搜集文物。因此，他们民族学的资料很丰富。天主教原人类学观点是泛埃及主义，认为一切文化起源埃及，再由埃及传播于全世界。我在辅仁大学期间，领导根本回避此一观点。我根本没有听说。不过，我比较喜欢的是匈牙利学者们，由于他们与古代匈奴有密切关系，他们熟练地掌握蒙藏文，然后对蒙藏史进行研究，比较确切、成功。其著名人物有李格蒂（Lee Getty）、乌瑞（Wu Rui）、卡内（Card）等。

另外就是，多学一点东西。比如说我去搞藏文翻译去了，藏文翻译是七千件，连普米的是八千五百件。我翻了四大件，三十三年，把腿的肉都翻没有了。所以不容易，必须学点藏史，学点羌史。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考古方面的，也可以学点，这三个是不可分的。何必不多学一点呢。就说：你学了考古，你必须要学历史，必须要学语言；你学了语言你必须要学考古，学历史；学了历史，你考古语言都要搞。就是这么个意见，多学点。

一方面还要坚持，不能动摇。你搞了你动摇，想做买卖发财，那不行，对你不利。就这么几个观点，三个观点。

我这个东西绝不了。不光我在搞，还有权威，羌语的权威中央民族大学的黄布凡教授，也在搞。我在考虑这个差百分之五的工作，就是在这儿摆到的，最大的敦煌1号南语写卷。1号南语写卷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我必须要完成，我再病了也要把它完成。我是学民族学的，半路出家，但是逼到那个语言学了，我才去搞语言学，现在整个陷入语言学里边。《敦煌古藏文拼写的<南语写卷>释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名字改成“研究”了。敦煌藏文，本来是藏文，但是它是南语写卷，那么干脆写“研究”算了。《南语写卷》这本书，加上大量的注释，我估计有一百多万字。只差百分之五了，我就害病，摔跤了，摔跤。我全力研究南语去了，没注意我的身体，所以这样糟了。摔在这儿（腰椎处），又是三个月了。

所以你们运气也好，碰到我还没死。我当然要充分的告诉你们，这里边的内容怎么走，得慢慢地谈。这个老师是重要的，我跟你说，我都是老师热心指拨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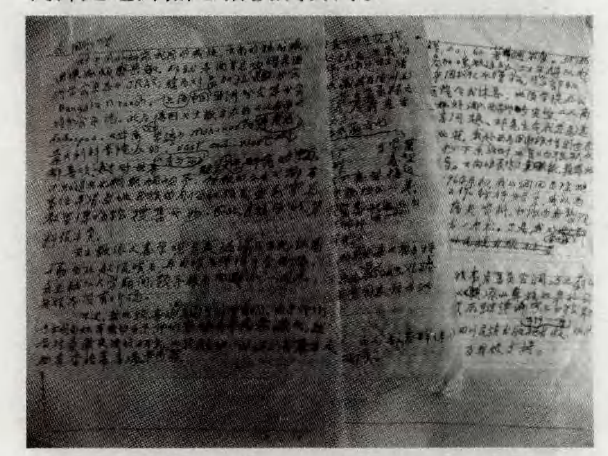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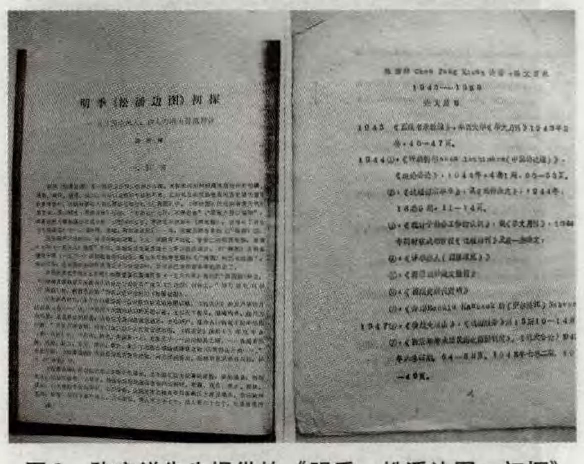


图8 陈宗祥先生对本次访谈提问的部分手写补充稿



明季《松潘边图》初探

图9 陈宗祥先生提供的《明季<松潘边图>初探》的论文复印件及他的论著、译文目录油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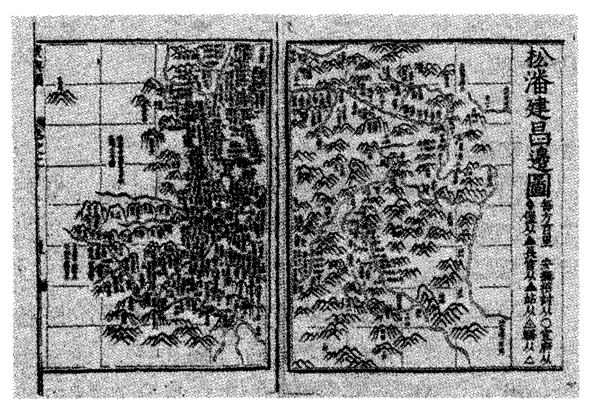


图10 陈宗祥先生提供的（明）《广舆图》之“松潘边图”（清嘉庆四年（1799）章学濂万历刻本）

说明：覃影、张强访谈，张强录入，覃影校订、整理，经陈先生及家人审校，授权公开发表。

注释：

①［奥］海门道夫 C. Von Furer－Haimendor：《苏班什里河的阿帕达尼族》，1953 年，是一篇中印边界东段的调查报告。附有地图一张，四十八张像片。当年即送交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副院长处。以后海门道夫出一专书，由吴泽霖先生译出。据胡文明撰《伏枥的老骥－记民族学家陈宗祥先生》，及所附：《陈宗祥的主要著译》（该文附于陈宗祥著《岭国社会组织初探》，土登尼玛、周锡银主编《格萨尔研究丛书》，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1994 年）。

②见下文，陈先生的相关资料，文革抄家时被毁。

③陈老手写补充：人口（包括男女黑主、男女曲伙、女锅庄、男女安家）、婚姻、锅庄、安家、曲伙、田地、房屋、牲口（包括猪、小猪、母猪、马、羊、牛、母牛）、冤家。

④参见［法］A. 大卫·尼尔著，陈宗祥译：《岭超人格萨尔王传》，陈先生在“译后记”中提到何剑勋教授提供给青海省文联出版该书译稿一事。

⑤老宁波以此比喻当学徒时被辞退的人。如果在学徒期间被辞退，这个人以后在社会上就抬不起头来。如果再去当学徒，就像“吃回汤豆腐干”一样没有味道了。

⑥据陈老介绍，当时小学学制为六年，“戴帽子”小学指的是小学设有初一年级的班。汇文小学与汇文中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

⑦1941 年 6 月顾颉刚受朱家骅之邀从成都到重庆主编《文史杂志》。

⑧［法］A. 大卫·尼尔著，陈宗祥译：《岭超人格萨尔王传》，《康导月刊》1948 年 9、10 期合刊载其序幕一、二；1960 年青海省文联出版全书译文；1985 年由杨元芳校订，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学界认为，任乃强为该书所作序言和《〈藏三国〉的初步研究》，以及这部译稿，是研究格萨尔王最早的参考资料。

⑨据陈老女儿介绍，还有曾受惠于此的人来看望过陈老，他们感谢陈老，说正是因为陈老当年的帮助，才使得他们走出大山，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⑩据陈波著《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李安宅小传》，李安宅 1941－1947 年担任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47－1949 年赴美英教书和访问。20 世纪 50 年代初，从军入藏。1956 年至西南民族学院工作。1962 年调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成都：巴蜀书社，2010 年。

⑪据李安宅先生的说法，“因为助学金数额小，在美生活不足，未能如愿。”参见李安宅著，陈波整理：《回忆海外访学》一文，《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16 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 年。http：//www. cranth. cn/1012/00007. html

⑫据陈宗祥、邓文峰著：《＜白狼歌＞研究》（一）增订版序言，陈先生迟至 1977 年才在北京再次看到《南语》一书，他复印了王尧转借傅懋绩自英伦带回的《南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4 页。另，据陈先生介绍，《＜白狼歌＞研究》增订版在 1991 年第一版的基础上，主要附录了《“於弥”为嗢末部落试证》、《试论缅甸的黑人白人部落群体》两篇重要的文章，这是他近年来研究《白狼歌》的新成果。陈先生在访谈中，还多次提及他尚有 5% 就快完成的《南语写卷》研究一书，可推知这些《南语》研究取得的成绩，都得益于当年所看到的李安宅先生买回的《南语》，并由此引发的好奇心和兴趣。

⑬请参阅陈宗祥、邓文峰著：《＜白狼歌

>研究》（一）导言·增订版，包括歌辞校勘、地望的探讨和本语研究述评三部分，对白狼语调查一事有涉及，可与陈先生的口述相互补充。

⑭陈宗祥、邓文峰著：《<白狼歌>研究》（一）增订版序言，据木里政协会普米族老人杨德福巴宗介绍，普米呷巴（姑复部落）的桃巴方言已变成了普米族的普通话，根本与《白狼歌》对不上。第 7－8 页。

⑮《白狼歌》研究（一）·导言，增订版，指出普米族的於弥语仅在木里县第二区原大坝乡（今改牦牛坪乡）波波、叶叶、泥珠等村落流行。第 19 页。

⑯陈宗祥：《试论缅甸的黑人白人部落群体》附录于《白狼歌》研究，第 260－287 页。

⑰陈先生的二女儿陈小珍老师遵父命，提供了她摘抄的法国三位结构主义人类学派学者，即 Lévi－Strauss，Claude 莱维－斯特劳斯·克劳德（1908－2008）、Rivers，William Halse 里弗斯·威廉·哈尔斯（1864－1922）、Mauss，Marcel 莫斯·马塞尔（1872－1950）的生平简介，便于访谈者了解这一学派的观点。陈先生认为，莱维－斯特劳斯指认的民族学上的“伽利略”即里弗斯·威廉·哈尔斯，“牛顿”即莫斯，其实都是结构人类学派的重要人物。结构派就是一个静止派，它不讲发展和事物的来龙去脉，切出一个断面，就下结论。摩尔根的进化论是由蒙昧到野蛮，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观，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两百年了，但是《参考消息》大多数评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今天还是站的住脚。

⑱关于熊部落等三个部落的表述，［法］克洛德·莱维－施特劳斯著，俞宣孟等译《结构人类学》（第二卷）（译著所据为 1996 年英文版，无此二图表）第二部分《社会组织》中提到：“在温内巴戈的例子里，雷丁说（1923，第 241 页），‘一个报告员……说……氏族是编为三个集团的，一个由雷乌氏族统治，另一个由水仙统治，第三个由熊氏族统治。’这足以证明，一个三元的系统是存在的，至少是以潜在的状态存在着。这真是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尤其是，这来自世界上一个还没有对实行三元系统怀疑的地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第 85－86 页。

参考文献：

［1］陈宗祥. 岭国社会组织初探［M］. 尼玛、周锡银主编《格萨尔研究丛书》，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1994.

［2］［英］海门道夫著，吴泽霖译. 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M］.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80.

［3］戴庆厦，黄布凡，等.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4］代刚. 康定木雅部落源流试探［Z］. 载格勒主编. 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5］陈宗祥. 横越大凉山［J］. 边疆服务 1947（15）.

［6］陈波. 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李安宅小传［M］. 成都：巴蜀书社，2010.

［7］李安宅著，陈波整理：回忆海外访学［Z］.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16 辑.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8］邓文峰，陈宗祥. 《白狼歌》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

［9］Chen Zongxiang. *A Discuss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Patterns on the Jade Zhang from Sanxingdui*［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5（6）p. 156

陈宗祥. 试论三星堆玉璋图案的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6）：156.

［10］陈宗祥. 汉藏语系民族与牛羊二系对照表［J］. 凉山民族研究，2003：335－368.

［11］［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著，俞宣孟等译《结构人类学》（第二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5－86.

收稿日期：2012－04－10　**责任编辑：王珏**